



〔法〕雅克·德里达 著 赵兴国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行动/(法)德里达著;赵兴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212-1

I. 文… II. (1)德…(2)赵… III. 结构主义学派-文学理论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69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4

字数:304 千字 印数:1 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目 录

前言：《文学行动》的基本观点	(1)
一、访谈：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	(1)
二、“……危险的增补……”	(42)
三、第一部讨论	(72)
四、在法的面前	(119)
五、类型的法则	(155)
六、《尤利西斯》留声机 ——听人说乔伊斯内心的“是”	(194)
七、《心灵》[节选] ——他者之发明	(250)
八、《签名蓬若》[节选]	(282)
九、不合时宜的格言	(304)
十、马拉美	(325)
十一、残酷戏剧和表演的封闭	(340)

访谈：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

本文根据 1989 年 4 月在拉古那比契市两天多的采访整理。

D. A. 你在 1980 年曾对论文评审人讲：“我最持久的兴趣——它甚至先于我对哲学的兴趣，如果这是可能的——一直是对于那种称作文学的创作的。”你已经发表了若干读解文学文本的文本，我们即将谈到它们。但是你的著述大部分是涉及那种称为哲学的更恰当的创作。你可否就你对文学的主要兴趣详细阐述一下你上述的说法，并谈谈它与你论述哲学文本的大量著述之间的关系？

J. D. 什么才叫“主要兴趣”呢？我决不敢说我的主要兴趣是倾向于文学而不是倾向于哲学。回想在这里是很危险的，因为我愿意忘掉自己的陈规旧习。而要这样做，我们必须先确定，在我的青年时代“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哲学”。那时候，至少在法国，两者共存于当时的主要作品之中。存在主义、萨特、卡缪，比比皆是，人们对超现实主义还记忆犹新。在那些作品中，出现了文学与哲学之间一种相当新型的联系，使两者做好这种准备的是一种民族传统，以及由学校教育确立为正统的某些范例。而且，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彼此之间似乎也十分不同。

无疑我曾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发生过犹豫，两者都不肯放弃。大

概是暗中寻求一个位置，使这个领域的历史由此得以构想、甚或被取而代之——于写作过程之中，而非仅仅借助历史的或理论的思考。既然时至今日使我感兴趣的既不能严格地称作文学、也不能严格地称作哲学，那么，我仍然以这样的想法为乐趣：我的青春期望——姑妄称之——竟然在写作中将我引向一种非此非彼的东西。它是什么呢？

“自传”大概属于最确切的名称了吧，因为对我来说，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最神秘与最公开的。此时此地，我打算以一种通常称作“自传式”的方式，回忆当我产生创作欲望时，在那种既暧昧又不由自主、既无能为力又独裁主义的状态下所发生的情景。喔，当时的情景就如同一种自传的欲望。在“青春期”自居作用（一种很执拗的自居作用，在我早期的笔记中，它常常执着于纪德的普罗秋斯的主题）的“自我陶醉”阶段，它首先是仅仅记下一两件往事的欲望。我说“仅仅”，尽管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个既不可能、又没有终结的任务。从深层看来，它类似一种出于信赖或忏悔的抒情活动。直到今天，我心中依然有一种执着的欲望，用回忆的形式、不间断地记录下发生的事——或未能发生的事。我总想斥之为诱惑的东西——即总记或总括——不正是维系我生命的动力吗？这种内心集语的想法——即后来我希望以略加精炼的方式记下一切的想法，得以将我引向卢梭（我自童年起就十分热爱的人物），引向乔伊斯。它首先是那种青春期望：要记下所有我经验过——或几乎如此——的声音的痕迹。那将是十分珍贵、十分奇特的，既是镜像式的，又是思辨的。我刚刚说到“未能发生”或“几乎如此”，以标明这样的事实：即发生的事，换言之，人们想要记下其痕迹的独特事件，也正是要求不发生的事会发生的愿望，并因此成为一个“故事”。其中事件本身已经使真实的档案与虚构的档案发生交叉。我们已经遇到了麻烦，这麻烦不在于确认，而在于区分开历史性叙述、文学虚构与哲学反思。

就这样，我曾经有过一种怀旧的伤感活动，想要保留下、或

许想要译成密码，总之是想要表现能够接近的和不能接近的。而且，在思想深处，它至今仍然是我最天真的愿望。我所梦想的既非一种文学作品，也非一种哲学著作，而是我想到的、有过的或未能有过的一切，都应该仿佛是加上封印（存放、密藏起来以便保留，这确实确实有如加印章，正是以印章的形式，连同横贯印章纹理的所有那些似非而是的东西）。我们可资利用的那些漫无边际的形式、客观性立档所谓的手段，与发生的（或未能发生的）事相比少得可怜，因此才产生极度总括的过分为行为。这种记下一切的欲望——我当然能够分析它、“解构”它，不过它是我所热爱、了解并确认的一种经验。谈及自我陶醉的青春期与“自传”梦，我现在要说一说（“我是谁？”、“谁是我？”、“这是怎么了？”等等）我所感兴趣的第一批文本，其中包括卢梭、纪德和尼采。这些文本既不单纯是文学的、又不单纯是哲学的，而是属于自白：《孤独漫游者的梦》、《忏悔录》，纪德的《日记》、《窄门》、《新粮》、《背德者》。同时，那位用第一人称讲话的哲学家尼采，一面又总在增殖专有名称、面具与署名。一旦事物有了一点积淀，那种任何事情、甚至连人们剥夺自己的东西——通过不间断的内心集语（假如集语还能做到是“内心”的）——都不肯放弃的事实，也不肯放弃运载这些声音的“文化”。在这一点上，包容各学科的诱惑变得与自传体不可分割了。而哲学讲演往往只是这种渴望的实用而重要的形式化。

同样地，这种全部的主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往返于文学与哲学之间。在我回忆中提及的那些天真的青春时期的笔记或日记中，对于扮演各种角色的执迷激发我对文学的兴趣，以致使我茫然认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筑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筑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筑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说明把所有的人物相互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括。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定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

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

为了认真回答你的问题，还有必要分析一下我的中学时代、我出身的家庭及其与书籍的关系或非关系，等等。不管怎样说，当我一开始发现这个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的时候，“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便以极天真的形式强加于我了。不久之后，这个问题便出现在萨特一篇初期文本的标题之中，我想那是在我阅读过《恶心》之后又读的（该书给予我强烈的印象，无疑在我心中激发起某种摹拟活动；简单地说，这是一部以一种哲学“情绪”为基础的文学虚构，这种情绪即存在是多余的、“是过剩”的，它正是使创作得以发生的未知意义）。接下来，便是面对这种允许讲述一切的建制或这类客体的困惑了。它是什么呢？当欲望刚好记下了某种东西，让它“存留”在那里，好像供他人支配的客体、那种能够被重复的客体，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存留”下来呢？“存留”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后来表现出或许有些过分推蔽的形式，然而自从青春初期我开始记笔记的时候开始，我便对这种往纸上寄存东西的可能性感到大惑不解了。这些问题的哲学生成经由我所进入的文化的某些文本的内容而进行——当一个人阅读卢梭或尼采的时候，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哲学——正如它经由对写作品的存留产生天真或惊异的困惑而进行一样。

后来，哲学的训练、职业、教师的身份同样都迂回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一般所说的写作是什么？”而且，在一般性写作的范围内，回到另一个问题、另一个更非单纯、个别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作为历史性建制有自己的惯例、规则，等等，但这种虚构的建制还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允许摆脱规则、置换规则，因而去制定、创造、甚而去怀疑自然与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的差别。这里，我们应该提出法律的和政治的问题。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

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它得其所哉地依赖于民主，而是在我看来，它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无疑它会到来）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

D. A. 你能否详细阐述一下你关于文学“这种允许讲述一切的奇怪建制”的观点？

J. D. 让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并非美文学或诗歌），世界是作家被给予特许，他可以讲述他想要讲或能够讲的一切，而同时得到保护，免受一切检查，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当霍梅尼要求杀死拉什迪的时候，我刚好完成一篇文本——并非不折不扣地满意它的全部陈述——文章认为文学具有一种“批评作用”。我不敢肯定“批评作用”这个词是否正确。首先，它要确定其使命来限定文学，确定其惟一的使命。这就是要给文学一个定论，给它指定一种意义、一种纲领及规范性典型。其实，它可能还有另外的基本作用，甚或没有作用，于本身之外毫无意义。而且，借助于同样的标记，它可以帮助思考或界定“意义”、“规范性典型”、“纲领”、“作用”及“批评”可能的含义是什么。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的批评作用属于一种语言。在西方，这种语言离开了政治、审查制度及审查的撤消与文学的起源和建制之间的联系，便毫无意义。说到底，文学的这种批评—政治作用在西方一直是很不明确的。讲述一切的自由是一种十分有力的政治武器，但这种武器又可以作为虚构而顷刻失效。这种革命力量有可能变得十分保守。作家也很可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有时候，他可以——我甚至要说他必须——要求某种不负责任性，至少是对于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关，比如兹大诺夫市那种类型的，这些权力机关总是企图把他召回到对于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机关十分明确的责任上来。这种不负责任的职责、这种拒绝就自己的思想式创作向权力机构作出回答的职责，也许正是责

任感的最高形式。对谁、对什么？这就是未来的全部问题，或者说由我刚才所说的未来的民主这种经验所允诺或允诺给这种经验的大事的全部问题。不是指明天的民主，不是明天就会存在的未来民主，而是那种其观念与将—来、与一种预定允诺的经验相联系的民主，它永远是没有期限的允诺。

作为一名青年人，我无疑有过这样的感受：即认为我所生活的环境中，讲述不允许讲的事情既十分困难，因此又十分必要和紧迫。总之，我对作家们讲述不允许讲的事情的那些情况发生了兴趣。对我来说，4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维希，官方的排犹主义，1942年年底的盟军登陆，1945年导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的几起严重事件中对阿尔及利亚抵抗力量的殖民主义残酷镇压），不仅是或主要是我的家庭处境，而且我对文学、日记、一般杂志的兴趣也意味着一种对家庭的典型的、定型的反叛。我对尼采、卢梭以及我那时大量阅读的纪德的热情，其中就有这种含义：“家庭，我恨你！”我认为文学是家庭的末日，是家庭所代表的社会的末日，即使从另一方面说家庭也受到摧残。那时候，种族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比比皆是，四处猖獗。作为犹太人和排犹主义的受害者，并不能幸免于当时充斥四周的反阿拉伯主义之苦，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不管怎样说，文学或曰“能够讲述一切”的允诺，是在我当时所处的家庭及社会环境中召唤我或指示我的主要原则。然而它远比现在用几句话来思考与说明的复杂和武断。同时，我相信文学很快也就成了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或欠缺的、难耐的经验了。如果说，我当时认为哲学的疑问至少是必要的，这或许是因为，我那时有一种预感，认为文学中有时会存在一种天真、一种无责任感或软弱无力。我以为人们不仅在文学中可以讲述一切而不产生任何后果——无疑这是很天真的——而且，实际上真正的作家也并不问津文学的本质问题。大概是基于我十分向往却又总是渺茫地高高在上地看待的文学作品所面临的那种无能与禁止，我的兴趣不久便转向关于文学的一种形式问题，要么是对言

语与书写的关系提出质疑的哲学机制的问题。哲学似乎也更具有政治性——我们故且说——更能够从政治的角度把文学问题同其要求的政治严肃性与后果性摆在一起。

虚构的可能性、虚构性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我必须承认，除了从分析写作技巧或某些单纯的鉴别活动中得到的乐趣外，我在内心深处大概从未从虚构——比如阅读小说——中得到过快乐。我喜欢一种虚构，比如说，有一种明显的假相或者混乱侵入到哲学写作中来了。而讲述或编造故事却是件从内心深处（抑或从表面上）不使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我很明白，这关系到一种巨大的被禁止的欲望、一种抑制不住的需求——然而却被禁止、阻断、压抑了——这就是去讲故事、听人讲故事，编造（语言或用语言编造）。但只要尚未清理出一个空间或安排好适于那个倦伏在洞中处于半睡状态的野兽的住处，它就会拒绝让自己露面。

D. A. 你刚才对“文学”与“美文学”或“诗”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你著作的其他地方也提到过（比如《在法的前面》一文中），你可否更确切地谈一谈所说的这种区别？

J. D. 这两种可能性并非是完全不同的。我这里所指的是历史的可能性：诗、史诗、抒情诗等不仅一直是口头的，而且不会引起一直被称作文学的东西发生。“文学”这一称谓是十分近期的一种发明。以前，书写对诗歌或美文学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著者所有权、个人署名也是如此。这个问题很大，很难在这里深入探讨。确定我们叫作现代文学的那套法规或惯例并不是必需要诗歌作品去遵循。希腊或拉丁语诗歌、那些非欧洲的东拉西扯的作品，在我看来，严格讲并不属于文学。这样讲一点也不损害它们应得到的尊重与崇拜。如果说名符其实的文学创作的制度或社会政治空间只是近期的事，那么这种空间不单纯是包围作品，而是影响作品的结构本身。我并没有准备即席地谈论这一十分严肃的

问题——不过我确实还记得在耶鲁的研讨会上（大约是1979—1980年）探讨过“文学”这个词的外观及伴随它的变化。“能够讲述一切”的原则（我强调它是一种原则），“原则上”赋予文学的社会、法律、政治的保障，在希腊—拉丁文化中并没有多大意义，更不必说在非西方文化之中了。这并不表示西方一直尊重这一原则：但至少是零零落落地、作为一条原则把它建立起来了。

话虽这样讲，但即便称作“文学”的现象是某年某日历史地出现于欧洲，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能严格地鉴别文学客体。它并不表示有了一种文学的本质，它甚至表示完全相反的意思。

D. A. 说起你所论著的文学文本，很明显，与那些哲学文本（我们仍沿用十分传统的分类法）相比，在运用语言与文学惯例方面，它们大部分属于20世纪，而且多数是现代主义的，或者说至少是非传统的（许多人会说“很难懂”）：像布朗肖、蓬热、塞兰（Celan）、乔伊斯、阿尔托、杰贝兹（Jabès）、卡夫卡等。是什么原因使你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这是否是依据你的工作轨道所作的必然选择呢？

J. D. 我所写到的、用来写作的、因之和为之写作的（该怎样说呢？这是个严肃问题），以其名义、为向其致意、依据于也可能是向其靠拢的文学文本——它们是怎样如你所说的，组成了一个性质相似的组合的呢？一方面，我几乎总是应别人的请求或挑衅而写作的，这些情况多半涉及当代作家，不论是马拉美、乔伊斯，还是塞兰、巴塔耶、阿尔托或布朗肖。但这种解释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还有卢梭和福楼拜呢）。更有甚者，我对那些期盼的回答并非总是俯首听命的。那些“20世纪现代主义的、或至少是非传统的文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写于文学的一种危机的经验之中。它们于本身之中、也可以说在它们的文学行为中产生了、引发了一个问题，一个相同的问题，但每一次都是独

特的、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出来：“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应该怎样处置文学？”这些文本引发出一种回转，它们本身就是关于文学建制的一种回转。它们并非只是反映的、镜像式的或推理的，它们并非将依据悬置他处，如愚蠢无知的谣言常说的那样。而它们这种经历的力量决定于这样的事实，即关于它们自身可能性的思考（一般的与个别的）在单独一部作品中被引发起来。假定我刚刚所说的情况是事实，那么我就更容易被引向那些对文学建制的危机（它更甚于危机、不同于危机）、对所谓“文学的末日”十分敏感的文本，从马拉美到布朗肖，除了那种“莫须有”的“绝对诗”（塞兰语）。然而，假定有称作文学的这种东西的这种似非而是的结构体，那么，它的开始便是它的终结，它始由于与它本身的设制性的某种关系，这就是它的脆弱性、它的缺乏独特性、缺乏客体。它的起源问题直接就是它的终结问题。它的历史的构建就像一个根本未存在过的纪念碑的废墟。这是一种毁灭的历史、一种制造事件以供讲述并将永不出现的记忆的叙述。它是最具“历史性”的了，但这种历史只能由变化着的事物进行构想，尤其是由现在所说的这一假设或假说进行构想——它还表示其他几种情况，不是吗？这种历史最具“革命性”了，但这种革命也将不得不加以改变，这情形或许正在发生……

这些文本形式的多种多样，但都属于不再单纯的文本，或者说不单是文学的文本了。而对于有关文学的那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它们不仅仅提出来，不仅仅赋予它们理论的、哲学的或社会学的形态，比如像萨特那种情况，而且，它们的质疑还与文学与批评的实行性（甚或是危机中的实行性）的机理联系起来。这些文本之中集中了我刚才谈及的两种幼稚的担心或愿望：写作以便记下时代的独特性或者使之发挥作用（那些一去不返的、不能重复的、作为允诺留在记忆中的允诺的经验、毁灭或废墟的经验）；与此同时，以同样方式对这种奇怪的矛盾、这一没有建制的建制进行质疑、分析和改造。

令人着迷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奇特性的经历，它有足够的能力形成与它相关的问题与理论法则。无疑我们将不得不回到“能力”这个词上来。这种语言所具有的“能力”、作为语言或书写而存在的能力就是：一种独特的标记也应该是可以作为标记而重复、反复的。于是它就开始与自身不相同，足以变成可以仿效的，因而就含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一仿效性重复的机制本身就是形成性的。它也还形成或浓缩历史。一部乔伊斯的文本同时也是一部几乎无限的历史的浓缩。然而这种历史的、语言的、百科全书的浓缩，仍然是与绝对单独的活动、绝对单独的署名分不开的，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的潜能——这的确是使我发生兴趣的地方。我并不是惟一被这种机制的能力引起兴趣的人。我努力去理解它的法则，而且还想界定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法则的形成永远不能结束或完成。恰恰是因为这种特点、日期或署名——总之是这种不可替代、不能转换的独有的奇特性——是能够这样子重复的，所以它既属于又不属于界定的一类。坚持这一似非而是的观点并非反科学的态度——而是恰恰相反。以所谓理性或逻辑常识的名义拒绝这种观点，才正是现代蒙昧主义所臆想的启蒙。

所有这一切尤其应当引导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语境”进行总体的思考。有时候我觉得文学的“机制”比其他门类诸如历史或哲学话语的机制更加有力。有时候——这依赖于独特性与语境——文学可能会有更大的潜力。

D. A. 你在《论语语法学》一书中说，“除了最近才真正被确认的提倡或者反对的目的之外，文学创作几乎时时处处依照各种不同的时尚、跨越各种不同的时代，一直在寻求我们所说的这种所指的过程中，使自己适合这种超验的阅读”。“使自己适合”这一短语表示，尽管大量的文学作品会引起这种超验的阅读，但它并

不强求之。你是否注意到以对抗或破坏这一主要传统的方法重读属于文学名下的一切的种种可能性呢？还是说，这一点只适用于某些文学文本，像你在《见解》中所谈的先于现代主义、能够与主要文学原型相对抗的“某种‘文学’实践”提示的那些文本？

J. D. 你说“使自己适合”，任何文本、任何话语，不论属于什么类型——文学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的、新闻学的，还是谈话式的——在任何时间不都是使自己适合这种阅读吗？就我刚刚列举的这些话语的类型（不过还可能有别的类型）来说，这种使自己适合的形式是不同的，每一种都得用特别的方法进行分析。反过来说，这些类型中没有一种是情愿地追求这种阅读。在这一方面，文学也没有纯粹的独创性。一篇哲学的或新闻学的、自然科学的话语，能够用“非超验”的方式进行阅读。“超验”在这里表示超越对能指、形式、语言（注意我并没有说“文本”）在含义或对象方面的兴趣（这正是萨特给散文所下的简要而又合宜的定义）。人们可以对任何类型的文本做非超验的阅读，而且，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成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完全是以像描述的或主观的——那种经验主义主观性或每个读者的异想天开。这种文本的文学特性记录在意向客体的一边，可以说，是在其知性结构之中，而不仅是在纯理性行为的主观性一边。文本之“中”存在着召唤文学阅读并且复活文学传统、制度或历史的特征。这种知性结构（作为“非真实的”，胡塞尔语）包含在主观性之中，但这是一种非经验主义的主观性，它与一种主观间的超验的共性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种现象学式的语言是必要的，即使在一定情况下——在写作与阅读尤其是文学写作与阅读中——它必须屈从于将现象学以及制度或传统之概念本

身置于危机中的东西（不过这个问题使我们离题太远了）。不中止超验阅读，但改变一下对于文本的态度，人们总是可以在文学的空间里重记任何陈述——一篇新闻、一条科学法则，或一段谈话的片断。因此就存在一种文学的作用和文学的意向，它是一种经验，而非文学的本质（天然的或与历史无关的）。文学的本质——如果我们坚持本质这个词——是于记录和阅读“行为”的最初历史之中所产生的一套客观规则。

然而，处理文学问题、将一篇文本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靠中止超验阅读是不够的。人们把兴趣放在语言的作用之中，放在记录的各种结构之中，不中止提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中止与意义或概念的武断的联系，而全然不顾构成文学客体的一切。这就是促成文学意向性之特异性的东西让人费解的地方。总而言之，一个文本自身无法避免使自己适合“超验”阅读。这种“超验”的要素是压制不住的，但它能够复杂化或被折叠包笼；而正是在这种折叠的游戏中，记录着文学之间、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不同文本类型或非文学文本各要素之间的差异。不要匆忙地划分阶段，不要说现代文学更加抵制这种超验阅读这类话，而是必须用历史来代替类型学。有一些类型的文本、一篇文本中的有些要素，与其他的相比更加抵制这种超验阅读，这一点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正确的。在前文学的诗歌或史诗之中（《奥德赛》与《尤利西斯》同样），这种提示及这种无法缩减的意向性也能够中止对意义与概念的“武断”、天真的信念。

即使诗歌与文学永远是不均等地、有差异地处于这种状况，它们也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中止超验阅读“武断”的天真行为。这也证明了这些经验的哲学力量，一种促使人们思考现象、意义、客体的诱发力——即便如此，它至少也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一种哲学动力。不过它只能在感应中、在阅读的经验中得到开发，因为它不像本质那样隐含在文本之中。诗歌与文学提供或者促成“现象学”的门径，以接近将一个命题解释为这一命题的东西。在

拥有哲学内容之前、在是或带有如此如此的“命题”之前，文学经验——写作或阅读——是一种“哲学”的经验，就它允许人们思考这种命题来说，它是中性的或中性化的。它是命题的、信念的、见解的、天真行为的以及胡塞尔所说的“自然态度”的一种非武断的经验。注视的现象学转换、胡塞尔所推荐的“超验的缩减”，大概正是文学的品质（我不是说其天然品质）。然而，极端地对待这一主张，我确实很想说（像我在别处已经说过的），我用来陈述这些内容的现象学语言最终要在它的确定性（绝对超验意识或不容置疑的我思的自我存在等）中被驱逐，而且恰恰是被文学的、甚或只是虚构与语言的极端经验所驱逐。

你还问到，“你是否注意到以对抗或破坏这一主要传统的方法重读属于文学名下的一切的种种可能性呢？还是说，这一点只适用于某些文学文本……”

再作一个“经济主义”的回答：假设有设立并从而构成文本的那种传统的与意向的空间，人们永远能够在文学中记下某种最初并不注定属于文学的东西。传统与意向性是能够改变的，它们总是诱导某种历史的不稳定性。然而，假如人们能够重读作为文学的一切，那么，有些文本其事件比其他文本更能够使自己适合于这种超验的阅读，它们的潜力更丰富、更密集。经济的观点就在于此。但这种财富本身并不引发绝对的评价——绝对稳定的、客观的及固有的评价。将这种机制理论化的困难正在于此。即使某些文本好像具有较大的形式化的可能，更有可能成为文学作品以及大量讲述文学因此也讲述自己的作品，即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现性在最小空间内有最大的可能的作品，那么，这也只能引发记录在语境中的评价、引发其本身就是形式化的、实行的定位阅读。潜能不像内在属性那样隐含在文本之中。

D. A. 对于某些赞同解构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来说，当一篇文本抵制我们刚刚谈论的那种超验阅读的时候，它就是“文学的”或